

我要拓宽人格空间而非看看戏演演戏

王晓鹰已经年过六旬,却依然在为话剧事业而奔波。他一辈子喜欢话剧,这是他的人生抉择,在30多年前他甚至为此而放弃赴理工大学就读的宝贵机会。所以虽然做话剧十分辛劳,但对于王晓鹰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他永远走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路上,目前尚未看到尽头。可以说,王晓鹰从一开始就是以“革新者”的面貌出现在话剧界。他执导话剧《雷雨》,把那个他认为并不怎么重要的鲁大海给删了,引起轩然大波。他执导《哥本哈根》,面对经典却敢于深挖人性,这份人性挖掘的酣畅,让人大呼过瘾。

王晓鹰说,做话剧就是要给人一种“深刻的快感”。“戏剧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快乐,灵魂拷问有被震撼感,和自己相关,不是那种欢笑着的轻松感,逼近观剧者的灵魂,想一些平时想不到的问题,当你看完戏之后体会观剧的快乐是深刻的。”这需要导演对于生活和人性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导演有一种敢于创新,敢于变革的勇气。“可以有鲁大海,也可以没有鲁大海。”这其实正是王晓鹰变革经典给人的一种启示。王晓鹰说,中国话剧要发展,要与世界接轨,就必须敢于创新。中国戏剧文化中有一种对人观察和思考的传统,每个话剧人就是应该找到这样一个传统,以此为抓手,努力推动“中国意象的现代表达”。

正是基于对中国话剧光明未来的期许,王晓鹰近年一直在强调推进青少年话剧教育,因为青少年是话剧的未来,只有从小培养话剧欣赏水准,才可能出现未来话剧的变革者。“其实话剧教育对于孩子来说,不能仅是让他们看看戏、演演戏,真正的青少年话剧教育应当是通过话剧艺术去扩展孩子人格成长的空间;通过话剧表演,能够体验到更丰富的情感;通过参加戏剧的表演合作,能够体验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1 考艺术院校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因为有实现的可能,也有实现不了的可能。

生活周刊:您现在已经与话剧连为一体了,在很多人眼里“王晓鹰等于话剧”,但是听说您的高考之路很曲折,甚至极有可能是去从事理工学科研究的。到底是什么让您弃理而从文?是家庭的影响,还是时代影响?

王晓鹰:选择走上戏剧之路,家庭跟时代都有影响。我出生在一个戏剧家庭,父亲母亲是戏剧圈的人,是安徽著名的演员和编导。我从小耳濡目染,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1975年高中毕业,去了安徽池州文工团做演员,这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后来我上山下乡,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们那一代年轻人都感觉到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我当然很期盼参加高考,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开始我报考的是理工科,因为我理工科成绩很好,数学和物理每次都可以拿100分。第一年我过了高考分数线,但不到学校的分数线,就没考上。1978年我考上了安徽工学院。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考的时候觉得应该为之好好复习,去创造自己的未来,等拿到通知书的时候,要收拾行李走另外一条路,又有一种不舍。当时我还在剧团工作,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毕竟我从小就浸淫在这个戏剧氛围里。当时剧团在排演《雷雨》,我演周冲,这个氛围令我沉

醉。越是临近去读大学,心中的矛盾就越激烈。那时候就有念头,要不就不做工程师了,还是留在戏剧领域。安徽工学院来了两封信催我去报到,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去了。当时想过还是要去考艺术院校,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因为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的可能。如果考不上,我就会一辈子留在皖南山区的小文工团里。于是全力备考,过去在剧团都想演好角色,但那一年也不争角色了,就一门心思复习。

生活周刊:您后来是怎么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一段学习生活对您的话剧之路有什么影响?

王晓鹰:1979年,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编导专业招生,很幸运,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个过程当时没觉得。很多年以后,回过去看,这个艰难抉择的过程对我的影响确实很深远。想过要把戏剧选择为日后发展的事业,和以后的人生捆在一起,而不是随机地顺应某个潮流。

1984年,我在中戏导演系读了5年后本科毕业了。学校把我分配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话剧院的前身。1991年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教育家、话剧导演徐晓钟的博士研究生。也就是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又一次排演了《雷雨》,这是我的学业剧目。

2 鲁大海成了曹禺先生心里的隐痛,我突然告诉他可以删掉,他是很高兴的,眼不见心不烦。

生活周刊:那就谈谈《雷雨》吧,当时很多话剧团都在排《雷雨》,但是您作为博士生学业作品的《雷雨》却是一鸣惊人。你觉得原因到底在哪里?

王晓鹰:当时排《雷雨》是全国各家话剧团的一股风气,而且我之前说了,在地方院团的时候我就排过雷雨,还演过周冲,所以我博士生作品排的也是《雷雨》。但是我的《雷雨》排出来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我删掉了鲁大海这个人物。这源于我无意间在图书馆看到1936年出版的《雷雨》当年的剧本,演的和后来的有很大不同。主要就是人物感情更加复杂,命运感的纠结,爱恨情仇的叠加,完全不是后来对于阶级矛盾的渲染,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回归曹禺本意,是不是能把鲁大海删掉。

在我排《雷雨》之前,话剧界对于经典的演绎还是比较僵化的,认为经典是不能改变的,最多只能讨论人物怎么演,从来没有想过换一个角度去研究经典。比如《雷雨》,是不是可以淡化里面的社会差异,去强化里面的感情,这些事情没有人讨论,反对的人倒是很多。我的《雷雨》排出来后,等于是开了一个头,让人们觉得其实面对经典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去讨论。几十年过去了,之后《日出》《原野》等经典都有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人们意识到,可以有鲁大海,也可以没有鲁大海。

生活周刊:听说,就此您与曹禺大师有过一段接触和交往。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晓鹰:我排《雷雨》的时候是1993年,当时曹禺先生还在世。当时我就在想,把鲁大海删了曹禺先生会不会同意,于是我去找他,磕磕巴巴地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曹禺先生非常豁达,马上同意不说,还分析说其实在他心里鲁大海这个人物写得最嫩,这个人物跟其他人物都没有很深的感情纠葛,把这个人物删掉,不会对剧本伤筋动骨。为了打消我的顾虑,给我更多勇气,曹禺先生还对我说:“不是每个人都



会像你我这样去想的,你将来作品排出来如果有人反对,批评你,那时候你就拿我当挡箭牌。”

我觉得曹禺先生晚年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思精神。比如说到鲁大海的时候,他就对我说,1933年他写《雷雨》的时候加进鲁大海这个人物,只是想体现一种进步,其实他对这个人并不了解。创作必须迎合一些东西,这是很痛苦的,但是阉割自己的作品同样很痛苦。鲁大海成了曹禺先生心里的隐痛,我突然告诉他可以删掉,他是很高兴的,眼不见心不烦。据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后来回忆,新版《雷雨》给曹禺先生的触动很大,让他有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快感”。

生活周刊:我们知道话剧是近十几年开始不断升温,成为一种时尚的。而在二三十年前,也就是您从中戏毕业担任话剧导演的时候,话剧是一个低谷。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您是如何度过的?

王晓鹰:我从中戏毕业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有一种说法叫“话剧危机”。“文革”之后话剧曾经有过

一段蓬勃期,到了我当导演的时候话剧跌入低谷。这个和影视剧的发展有关系,很多观众都去看影视剧了,话剧的观众就少了。

当时很多话剧导演都拍电影去了。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学习蒙太奇的剪辑规则,其实也可以去拍电影,但我坚持做话剧,不愿意涉足影视剧。我恐怕是这一代话剧导演中唯一没有“触电”的导演。为什么我能够坚持呢?是因为在我看来,话剧和影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电影和电视剧,比较相似,用镜头蒙太奇做导演语言构成,用一些工业手段技术手段来完成;而话剧基于创作艺术手段,比如在固定舞台上对时间空间的处理,对舞台调度的处理等等。我认为话剧最能直面演员赤裸裸的情感,直面人的有机生命状态,更逼近人的内在真实和生命感受,更能深刻挖掘人性真实。更何况,话剧本来就是自己的人生选择,当年为了话剧,我都放弃了读理工大学的机会。我能轻易地转行拍影视剧吗?我坚持了下来。



剧照。

本版受访者供图